

陈垣

撰

元西域人华化考

蓬

菜

阁

丛

书

陈智超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陈垣

撰

元西域人华化考

蓬

陈智超 导读

莱

阁

丛

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元西域人华化考/陈垣撰;陈智超导读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.12

(蓬莱阁)

ISBN 7-5325-2810-3

I. 元… II. ①陈…②陈… III. 古代民族-民族同化-研究-中国-元代 IV. K2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3264 号

蓬莱阁丛书

元西域人华化考

陈垣撰

陈智超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5 字数 122,000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,000

ISBN 7-5325-2810-3

K·308 定价:9.30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传统学术，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，从清末民初起，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。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，融通中西，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，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，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“世纪回眸”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。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，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，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，剔抉其精义要眇，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、历史文化背景，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，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，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。相信这一设计，会比单出原著，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，来得更切近可靠。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，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，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。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，有“汉家石渠阁，老氏蓬莱山”之称，后世遂称藏书阁为“蓬莱阁”，因借取而为本丛书名。

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导读

陈智超

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，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，故其言如此

——陈垣^①

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(以下一般简称《华化考》)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。这部著作全文不过八万字，但它奠定了陈垣先生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，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。

(一)

本文开首引用的，是陈垣先生在1964年回答一位老读者信中的一句话。它是了解本书写作背景、写作目的的一把钥匙。

《华化考》作于1923年，即民国建立后的第十二年。辛亥

革命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,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。列强侵略,政客争权,军阀混战,民不聊生:这就是当时的现实。

陈垣先生为了中国的独立、民主、富强,青年时代就投身于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,1905年25岁时在广州与友人创办《时事画报》,用文字作革命宣传,并加入同盟会。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员,定居北京。残酷的政治现实,沉重地打击了他青年时代的美好政治抱负,1923年开始,他彻底转向史学研究,但并没有放弃报国之志。

这时的中国,不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以至国民体质,处处落后,被人讥为“东亚病夫”,就是学术、文化也处于落后状态,为人轻视。据他的朋友、学生们回忆,当时陈垣先生萦回脑际的中心问题,就是就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,与志同道合者一起,努力把汉学中心的地位从外国夺回中国。

例如,胡适1959年1月3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团拜会上说,20年代“在北平和沈兼士、陈援庵两位谈起将来汉学中心的地方,究竟是中国的北平,还是在日本的京都,还是在法国的巴黎?”^②

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郑天挺回忆,1921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一次集会上,“陈老说: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,不是说巴黎如何,就是说西京(日本京都)如何,没有提中国的。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,夺回北京。”^③

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翁独健在1978年回忆道:“1928年,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,在课堂上听到陈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: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,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,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。”^④

他在北平师范大学时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,陈老师“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,常说:‘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,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。’因此,他就更加努力钻研。”^⑤

他在3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朱文长回忆当时他就时局发表的看法:“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;一个国家的地位,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。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个所干的,努力和人家比。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,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,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。我们是干史学的,就当处心积虑,在史学上压倒人家。”^⑥

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的写作,就是陈垣先生为此所作的一次努力。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?

过去提起中国的盛世,不是汉代的文景,就是唐代的贞观、开元,清代的康乾。提到元代,最多说它的武功显赫,而更多的是注意它的残暴统治。陈垣先生在辛亥革命前所写的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中,有一些也是借揭露元代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而影射清朝的。清朝的统治被推翻了,形势发生了变化,启发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元朝的得失。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,使他想到了正是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。但他注意的不是元朝的武功,而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,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少数民族,来到了中国,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,接触了中华文化,受到感染,为之同化。阐明这一历史事实,正符合他要唤醒国人,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。

所以他在《华化考》一书中意味深长地强调:“自辽、金、宋偏安后,南北隔绝者三百年,至元而门户洞开,西北拓地数万

里,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,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,一旦尽发无遗,西域人羡慕之余,不觉事事为之仿效。故儒学、文学,均盛极一时。而论世者轻之,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,明人蔽于战胜余威,辄视如无物,加以种族之见,横亘胸中,有时杂以嘲戏。元朝为时不过百年,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,亦指此西纪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间之中国文化耳。若由汉高、唐太论起,而截至汉、唐得国之百年,以及由清世祖论起,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,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,则汉、唐、清学术之盛,岂过元时!”(卷八第一节)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观点。

他在书中郑重声明:“吾之为是编,亦以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而已。”(卷二第四节)为此需要对本书题目所用的“西域”及“华化”两词加以说明。

“西域”一词始见于汉。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,是为人们熟知的史实。时代不同,西域的范围也有变化。元代开疆辟土,西域的范围较以往扩大许多。元时又有“色目”的名称。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们分为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四等。元代的色目人与历史上的西域人范围不完全相同。《华化考》所论者是色目人。为什么作者不用“色目人”而用“西域人”,他是这样解释的:“西域人者色目人也。不曰色目而用西域者,以元时分所治为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四色,公牍上称色目,普通著述上多称西域也。”(卷一第一节)关于题目中的“华化”,检阅现存的《华化考》的提纲和初稿,提纲先作“中国化”,后改为“汉化”,初稿沿用“汉化”,至定本改为“华化”,但文中还保留少数“汉化”之词。改“汉化”为“华化”,我们固然可以作这样的解释:元代的汉人与汉族人不是同义语,“汉人”不但指汉族,也包括契丹、女真、高丽等族,而元代的“南人”中大部

分是汉族。但如果我们联系到本文开首所引的陈垣先生的话：“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，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，故其言如此。”他不曰色目人而曰西域人，不曰汉化而曰华化，以西域人与华人相对，以西化与华化相对，其故可深长思之！

(二)

《华化考》的主旨是证明元代“西域人之同化中国”，但这只是作者写作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。这个目的能否达到，也就是说这个论断是否成立，并为人们所认同，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历史现实，作者提出的论据是否正确、充分，论证是否符合逻辑。

作者在界定了元时西域人的范围之后，又对“华化”的意义作了这样的规定：“以后天所获，华人所独者为断。”所以，“或出于先天所赋，或本为人类所同，均不得谓之华化”。（卷一第三节）

“华化”的定义既明之后，作者又是从哪些方面论证元时色目人之华化的呢？

第一，儒学：“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，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。”（卷二第一节）

第二，佛道两教：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，自不必说。“佛教非出于中国，然元时佛教之入中国，已千三百余年，本分禅、教两大宗，其禅宗早已成为华化。倘其人之佛学得自梵文，或得诸西域，固不可谓之华化；倘其佛学系由汉译经论，或由晋、唐以来之支那撰述而得，而又非出家剃度、身为沙门，仅

以性耽禅悦，自附于居士之林，则不得不谓之华化。”（卷三第一节）

第三，文学：包括诗、文、词曲。这当然指的是中国诗、中国文以及在元代文学中最具特色的元曲。

第四，美术：包括书法、绘画和中国建筑。关于书法，作者说：“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，以其为象形文字，而又有篆、隶、楷、草各体之不同，数千年来，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。然在拼音文字种族中，求能执笔为中国书，已极不易得，况云工乎！故非浸润于中国文字经若干时，实无由言中国书法也。”（卷五第一节）关于绘画，“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。以元版图之大，即有西域画家挟罗马、波斯、土耳其之画法，以显于中国，亦并不奇；然此之所谓画家，乃中国画法，非西域画法，故不曰西域画家，而曰西域之中国画家也。”（卷五第二节）

第五，礼俗：包括名氏、丧葬、祠祭、居处之仿效华俗。作者说：“试一检元人文集，种人（超按：此处指色目人）之请字请名者触目皆是，其人皆慕效华风，出于自愿，并非有政策之奖励及强迫，而皆以汉名为荣。”（卷六第一节）又说：“封建社会最大之礼制，莫过于丧葬。”（卷六第二节）

由此可见，作者所说的华化或同化，是指文化上的影响、吸收、接受或认同；也可见作者考虑之周全和规模之宏阔。

本书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有鲜明的特色。

第一，材料富。许冠三在评述《华化考》时说：“仅就资料的丰实言，已属前无古人。全书七万余字，共用材料二百二十种，以金石录和诗文集为主体，所引元、明人诗文集约百种，在一般史家常用的正史、方志、杂记、随笔外，连画旨、画谱、书法、进士录等，亦搜罗无遗。如此的繁富而多样，仅有晚年的

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。”^⑦

第二,版本多。许冠三又说:“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所以缜密服人,‘多聚异本’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。如考余阙华化,所见《青阳集》,即有元刊五卷、六卷本,明刊九卷本和四库六卷本四种。考丁鹤年事迹,所据鹤年著述则有两种版本:一、艺海珠尘本《丁孝子诗集》,二、琳琅秘室本《丁鹤年集》,所参考的戴良作品,亦有两本:一是琳琅秘室本《丁鹤年集》戴序,二是收入戴良《九灵山房集》的《鹤年吟稿序》。前者是初稿,后者是定本。”^⑧

第三,善利用。美术篇的西域之中国书家和画家两节,作者写作时较其他篇省力,因为他利用了两部“极现成之书”,即元代陶宗仪的《书史会要》和夏文彦的《图绘宝鉴》。论证西域人名氏效华俗,则利用了元人文集中触目皆是的“字说”。但在论述西域人丧葬效华俗时,因为诸家记述极少,他多方搜集材料,利用了当时很少有人利用的《元典章》,从元代禁止畏吾儿仿效汉儿丧葬体例中反证:“必其有所效,而后有所禁也。”(卷六第二节)

许冠三还评论说,《华化考》“论证的谨严,亦是当代罕有。如证《丁鹤年集》通行本皆明刻说,共举五证;证证确切。又证丁氏为回回一节,则有八证。且举证皆按效力强弱定先后,条理井然。”^⑨

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,无论是主题的选择,材料的运用,以至著述体例、学风等方面,都给了并将继续给后人有益的启示。他当年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“夸彼善俗、思革吾华风者”,应为后人铭记。

《华化考》也有一些具体的、细节的失误,比如鲁古讷丁、

别的因、秦不华、鬲实带、郝天挺等人是否为色目人？有的肯定不是，有的还有争论。

学无止境。譬如积薪，后来居上。在前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，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，也是后继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(三)

《华化考》完成以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。

《华化考》初稿写成之后，在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发表(前四章)之前，作者曾将油印稿分别寄给包括鲁迅在内的国内外的一些学者。

第一个反映来自日本学者桑原鹭藏。桑原比作者年长 10 岁，毕业于东京大学，此时是京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，正是日本汉学中心中的一位中坚人物。桑原于 1924 年春天收到《华化考》油印本，在当年 10 月出版的《史林》杂志发表了题为《读陈垣氏之〈西域人华化考〉》的书评。^①书评一开始就说陈垣是现在中国史学家中“尤为有价值之学者”，“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，殆未之见也”。他认为陈垣研究的特点有二。第一，是在研究中国与外国关系方面，“裨益吾人者甚多。氏之创作以《元代也里可温考》始，次如《国学季刊》所揭载之《火袄教人中国考》、《摩尼教人中国考》两篇，资料丰富，考据精确，为当时学界所见重”。第二，则是书评一再强调的，研究方法的科学。桑原还说，《华化考》“博引傍搜元人之文集、随笔等一切资料，征引考核，其所揭之各题目，殆无遗憾”，不但研究元史，即使是研究中国文化史，都应参考此书。桑原的评价多处以陈垣与其他中国学者对比，读完这篇书评，如果再参看桑原大约同时写

的评论柯劭忞《新元史》、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的文章,更可以体会到,为什么陈垣先生说“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”,为什么他一再提出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。

王国维读《华化考》油印稿后,于1925年2月向作者寄赠有关李珣材料一条。李珣是唐代土生波斯人,能作词,《花间集》收录其词作37首,可称为元西域人华化之先导者。以后周肇祥、英华也告以同一材料。^①作者则受此启示而联想及李珣之妹、前蜀王衍昭仪李舜弦,能诗能画,为增《西域妇女华化先导》一节。

1929年,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,给应聘为该所特约研究员的陈垣先生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缔交信。信中说:“斯年留旅欧洲之时,睹异国之典型,惭中土之播落,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,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。是若可忍,孰不可忍?幸中国遗训不绝,典型犹在。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,先生鹰扬河朔于后。二十年来承先启后,负荷世业,俾异国学者莫敢我轻,后生之世得其承受,为幸何极。”^②傅斯年现存信件多已刊出,看过他的信件的人,都会感到这是他最谦恭的一封信;而了解他的性格的人,又会知道这绝非客套之词。他所以作出这样的评价,除了同有将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志愿之外,也是觉察到了以《华化考》为代表的陈垣先生的前期著作所达到的水平与产生的影响。

无独有偶,还有一位学者将王国维与陈垣并提。但他不是中国人,而是法国的伯希和。他说: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,惟王国维及陈垣两人。^③

1934年冬,陈垣先生将先后分别发表在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和《燕京学报》上的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上下篇木刻出版,请

陈寅恪作序言。陈寅恪在 1935 年 2 月写了《重刻〈元西域人华化考〉序》。序中说：“是书之材料丰实，条理明辨，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，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。”又说：“近二十年来，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，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，其论史之作，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，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，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，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，盖先生之精思博识，吾国学者自钱晓征（大昕）以来未之有也。”又说：“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，察其持论，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。先生是书之所发明，必可示以准绳，匡其趋向，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，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，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！”陈寅恪在写序同时，对书中一些具体提法曾提出意见，作者也作了相应的修改。^⑭一处是卷二儒学篇第五节摩尼教世家之儒学，排印本“噉欲谷为回纥谋臣”，木刻本改为“偃氏世为回纥贵臣”。另一处是卷四文学篇第一节西域之中国诗人，排印本“迺贤直托尔斯太一流之所自出也”，木刻本改为“迺贤与托尔斯太一流正有些相类”。“正有些相类”，与作者一贯的文风不类，细察木刻本，知此数字为剗改补刻，似为陈寅恪来函原文，作者一为尊重对方意见，一为将就刻版字数。在此之前，大约是 1930 年底至 1931 年中，两人就曾对《华化考》书中的不忽木其人进行过讨论，现存的一纸二陈笔谈遗墨是其见证。原来，陈垣先生在校勘沈刻《元典章》时，发现在《元史》等书中多次出现的不忽木，在《元典章》中作不忽术。究竟是“木”还是“术”？在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之前，他没有下结论，而是向通晓多种文字的陈寅恪请教，想从语言学方面寻找证据，再作判断。虽然没有找到强有力的证据，但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献和记录。^⑮

1966年,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的英译本由钱星海和 L. Carington Goodrich 翻译、注释,作为《华裔学志丛书》之一,在美国洛杉矶出版,1989年又在德国再版。这时距本书首次发表的1924年已经六十五年了。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本书长盛不衰的学术生命力。

(四)

《华化考》一共有五种文本。

一、初稿:大部分保存下来了,分为三册,每册封面都有陈垣先生题字:“西域华化考史料”(上、中、下),并题“十二年十一月”。装订次序同全书篇章次序并不完全相符,原稿与其它有关《华化考》的史料合订在一起。这种装订法反映了作者写作的一个特点:他总是先将有关材料收集齐全,然后挑出第一手的、准备引用的材料。引用时常作许多删节(他一再强调,引文不可改,但可删),并把它们联缀成文。初稿的主要特点,如前所述,定本中的“华化”,初稿中一律作“汉化”。

二、油印稿:至目前为止,只知道仅存一部,藏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的“桑原文库”。线装上、下两册,每半页10行,行25字。卷末注有“十二年十月九日写于北京西安门外恒德厂”,由此可知本书完成的准确时间(1923年10月9日,作者当时尚未满四十三岁)和作者当时在北京的寓所。上册封面有作者题字:“桑原鹭藏先生指正/陈垣敬呈十二年十二月”。^{①⑥}这就是作者赠与桑原之本。桑原逝世后,根据他的遗愿,全部藏书赠与京都大学,本稿也在其中。初稿中的“汉化”,在油印稿中绝大部分已改为“华化”。

三、排印本(正式发表本):1923年12月,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的前四卷,后因该刊经费困难,久未续出。直至1927年12月,后四卷才发表于燕京大学《燕京学报》第二期。前后相隔竟达四年之久。排印本按当时刊物的规格,加了标点符号。

在前四卷发表之后,后四卷尚未发表之前,作者还应杂志之请,抽出全书部分内容,以《元基督教徒之华学》和《十四世纪南俄人之汉文学》的题目分别发表在《东方杂志》二十周年纪念号(1924年1月)和《小说月报》第七号号外,中国文学研究下册(1927年6月)上。

四、木刻本:1934年,作者将全书木刻出版,作为《励耘书屋丛刻》第一集的第一种。木刻本对排印本作了若干补充修改,将标点符号改为断句。此本在台湾和大陆都有盗版。

五、1962年修订本:1962年,中华书局拟将此书重新排印出版,作者对木刻本内容没有增删,只是对个别提法作了删改。如卷四文学篇第一节西域之中国诗人,作者在引迺贤《新乡媪》诗后所作解释,原作“第二截写资本主义之压迫”,改为“第二截写豪门势力之压迫”等。可能因为西北问题当时为政治上之敏感问题,出版未果。这次重排,采用作者1962年修订本,对个别标点符号作了修改。

2000年11月12日是陈垣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,本书的出版,也是对他的很好纪念。

二〇〇〇年六月于北京

注释:

①陈智超编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第 818 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出版。

②胡颂平编著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第 8 册第 2789 页,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4 年第 2 版。原文作“二十年前”,1959 年之二十年前为 1939 年,当时根本不可能谈此问题,“二十年前”应是“二十年代”之误。

③郑天挺《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》,北京师范大学《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》第 12 至 13 页。

④《光明日报》1978 年 3 月 11 日报道。

⑤柴德赓《我的老师陈垣先生》,载柴氏《史学丛考》第 436 页,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。

⑥朱文长《北大与北大人》,《东方杂志》第 40 卷第 7 号,1944 年 1 月出版。

⑦许冠三《新史学九十年》上册第 115 页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。

⑧同上书第 123 页。

⑨同上书第 115 页。

⑩原载《史林》第 9 卷 4 号,后收入《桑原鹭藏全集》第 2 卷,东京岩波书店 1963 年出版。有陈彬和中译本,发表于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》第 1 卷 6 期,1925 年 11 月 18 日出版。

⑪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第 227 至 228 页,233 页,参见本书卷七第一节。

⑫陈智超《陈垣先生与中研院史语所》及杜正胜《无中生有的事业——傅斯年与史语所的创立》,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《新学术之路》第 236 至 237 页,27 页,34 页,1998 年出版。

⑬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第 96 页,尹炎武函。

⑭同上书第 378 页。